

# 来华游记的东方主义模式化写作

## ——以福琼《两访中国茶乡》为例

敖雪岗<sup>①</sup>

〔摘要〕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来华游记的写作开始呈现出东方主义的特征，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者自身的目光来观察和书写东方文化。游记写作也开始遵照一些固定的模式进行，一是将中国看成是个一成不变的客体，一个因凝固化而难以交流的对象，其二则将它归入西方的叙事传统中。

### Orientalism in Robert Fortune's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o Xuegang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travel writings by Western adventurers to China

begin to show some signs of Orientalism. Some travel writings follow a few set writing paradigms, and one of them is to regard Chinese culture as a static object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Another paradigm is to convert spatial distance into time distance, regarding China as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West. Through such paradigms, the West then obtains discursive domination over China. British botanist Robert Fortune's travelogue,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is a forerunner.

〔Key Words〕 Orientalism; travel writing; Robert Fortune

从鸦片战争开始，后来又有欧洲列强的侵华战争，整个中国被纳入了西方的殖民版图之后，更多外交官、探险家和商人来到中国，这些人经常留下中国旅行后的笔记或书信，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这些随笔性著作，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十八世纪以来成为转折点，之后西方学者对中国介绍大有裨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旅行更是渐成流行的写作研究模式，古往今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叙述中，中国形象也渐渐被定型，并被对中国的描述传播给西方读者。

① 作者简介：敖雪岗，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文化教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

正如美国人类学者博厄斯所说,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由你生长的文化环境提供给你的(Stocking, 1968:145)。实际上,每个游者都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些常识观念以及知识体系,然后用这些观念和这套体系来观照周围的世界,这样,世界对每一个游者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一旦游者遇到一种新文化,一种异质文化,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可能认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对周边社会和自然进行构建的众多方法或者说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这些异质文化有他们自己应对环境、相互打交道的一套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组建起社会,发展出自己文化。

游客书写游记,或写作书信向国内介绍他国文化,书信和游记可以起到一种类似于中介的作用,在他文化和自身熟悉的文化之间调和一下,但具体是哪种调和方式要看他者文化与母文化之间冲突的强烈程度,有赖于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和写作者是否坚信自身文化与理念有关。

所以游记通常都带有自传性质,是作者个人内在和他所处时代背景的一种反映。作者来到一个新地方伊始把自己看到的新鲜的事物记录下来。作者游记录进在游历时时候其真实目就是在对这个地方进行一次重构。对外国人来说,他要用自己的母语来介绍一个他国,介绍的过程也就是重构这个国家的过程(Porter, 1991:19)。这种重构,既是外界真实的反映,同时又是作者个人关注焦点和视野的反映,他关注哪些东西,记录什么东西,实际上都是他有意无意选择的结果。他对异域风情、物产、民俗的描绘,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和体会,也因此打上了作者自己的职业经历、教育背景、思想、情绪等烙印。所有这些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的综合影响的游记往往成为他者文化之国的代表(Horley, 1991, 16-5)。

虽然欧洲殖民地时期人物的建构,成不了游人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政治人,终究是全人类,总归从政治角度世界中心地带中走出来以外的区域和事物都很少有人关心。在这些言辞飘渺的梦想中,欧洲人渐渐更新了他们对亚洲的认识,从而得到了全新的开辟(简微琪, 1995, 124)。随之而来的就是后来华裔客土及其后裔们,纷纷来到中国,四处一勃然不休。

的文化,为了顺利传教,他们采取由上到下的传教策略,所以对中国文化采用一种接纳包容的态度,不再依靠他那由母体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双眼,而是试图从一种新构建出来的理念体系来理解他者文化。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同情之了解,称赞中国的政治、道德哲学等制度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甚至不无仰视地看待中国,沿用中国人美化自己国家的说法,把中国称为“天朝”或“花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古国,在文明程度上不低于西方世界。于是在写作介绍中国的游记和书信时,这些作品就都带有一些自我文化反省的性质。而这些游记和书信传到欧洲,引起同时代欧洲思想家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大真正完美的形象。伏尔泰也曾说:他们有最完美的道德科学,它是科学中最重要的(赫格斯, 1995:200)。他们被给予着一个完美的榜样。

十六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十七世纪末,西方渐渐进入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工业机器

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其实,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头脑中有关中国的知识已经大大增长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包括杜赫德,对中国科举制度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过了它的巅峰,即使不具有了其政治上的普遍意义,欧洲启蒙运动仍然有一种渴望了解东方的神秘感。它肯定了东方文明的古老性,并将其与西方文明区分开来。他们通过对新发现世界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编成书,用以说明欧洲人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从中产生出一种可以支配、重构东方的西方模式。中国和印度、非洲等地区一

时被看作是“野蛮的、落后的、未开化的”,而欧洲人则被看作是“文明的、进步的、开化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并逐渐形成了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的。

如果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算起,那么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这股潮流越演越烈,而鸦片战争前后,正是这股潮流逐渐成形的时候。这一阶段的国人来华游记,与先前国人游记有了质的区别,同时也开创了后世国人游记的新纪元。

也因此和此前外国人不太一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某些方面开创了后世游记的新纪元。下文将以福琼游记为例分析这些东方主义式的中国讲解模式的特点。

## 二

东方主义的游记写作模式就是以西方为中心,通过作者自身的母文化来观照东方文化(萨义德,1999:2-6)。具体到西人的来华游记,其模式有二,本节介绍第一种,即,将中国看成是个一成不变的客体,一个凝固化因而难以交流的对象。

十八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观念在西方渐渐深入人心,来华游者在通过所谓科学考察之后,认为自己抓住、掌握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本质特点。我们以福琼的游记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写作后面体现的思维模式。福琼因为与鸦片走私船一起待过一段时间,见识过清朝海军的行事方式,他于是断言自己发现了中国将领与军队的特点,他写道:

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虚张声势的作法。有时候,其时以英勇善战而知名海军将领,也会乘坐带着很多士兵的军舰

<sup>1</sup> 纳斯·拉扎里(Nasir Lari)指出,“在福琼的游记中,他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武力消弱的王室内宫。与此同时,那些小得无法形容的都督们却拥有很大的权力,很容

久今人。而武定此而甘帆挂旗而归海也。不得不诉曰王相率同僚上表曰。不图将帅但

来的消息称，“那些外国船只都是全副武装，它们不肯挪地方”。这样的消息足以让带队将领冷静下来，不再逞勇，于是他便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既不敢向这些外国带来的船只开火，又不能任由它们向左岸靠。如果他子弹耗尽后开枪，而且把生

活的人打伤，他就会被扣上“滥杀无辜”的罪名，而如果他不开枪，他就会被扣上“纵容匪类”的罪名。他左右为难，他只能选择向左岸靠，这样他就可以把生

屿的夷人已被赶跑，甚至无中生有，说发生了一场战斗，俘获并摧毁了一些夷人的船只，以此来夸大渲染他的光辉成就。这就是中国人的办事方式。（福琼，2015：119-120）

不得不说，福琼把中国官员与军队那种虚张声势、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欺上瞒下的特点写得活灵活现，也非常准确。可是，他没有批评西方鸦片走私商人的蛮横无理，在装备有当

时最先进的武器的武装鸦片走私船面前，落后的清朝海军手力均其胆寒。但福琼却在对清军的评价中，把清军的这种特点归结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办事方式。比如中国军队的假模假样，在当时委靡之下，中国军队可能确实有这样的表现类型，可是西方学者却不会深入考察，假如不是这样行事，又会产生何种可能。因为这些特点的得出是通过西方标准衡量而来，自然不

有空虚客气的成分更多，这股与无能者无异的空虚有什么区别了。“当中国人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时，他们唯一考虑的是，是谎言是否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还是皆假话？哪种办法更能接近目标，他们就选择哪种，也许，他们最想追求的是皆假话。”（福琼，2015：197）“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他们不会质问讲实话，除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我常常认为，如果对他们有些无谓的话，他们要愿意说假话。”（福琼，2015：269）“许多中国人一点真诚性也没有，为了得到录取的利益，他们可以欺骗性十足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徒，或者某行某业的模范标兵。但是像他们一样没趣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地地道貌。”（福琼，2015：112）

虽然福琼对清军的评价很严厉，但福琼这样的论断以偏概全，带有很强的先天偏差，他没有耐心也不愿意去了解更多

其实,这种态度本身就表明福琼内心对中国的一种排斥,对中国及中国文化采取一种完全视为他者,难以交流、难以变化。将中国看做是化石,摆出一副摸清了中国人中国政府办事特征的样子,这其实是西方汉学的一种潜在意识,即把中国看成是一种业已僵化死去、没什么生气活力的东西。王德昭先生对福琼的评价是:“福琼是欧洲殖民地的伊壁,虽然过去没有留下什么,但是奇异的、独特的。”“最奇怪的是,毛虫,或者飞蛾,它们乍一看入骨深寒的快乐,充满毛虫常在黑暗且逆行,这与我们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礼节概念可是差得太远了,不知怎么还,我们天朝上国的民众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恰恰相反。”(福琼,2015,62)而这些差异的撞击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中国象征。正如英皇学者博格斯所说,像福琼这样的旅行者本想其君“所觉得的就是他们手头所掌握的文化的描述和具有机敏性的象征,然后又把这些描述和象征在他们之间放大”(博格斯,1998,14),就在这个过程中,中西形象渐渐互融互嵌。

### 三

写作模式的第二种是与中国游历是平等兼和的两个方面,比如这本书开始时的双方,或者对时代的美丑两个选项。中庸与西方是两种彻底的对立,但质朴德行素朴和雅知高逸的气质距离,其中一个做法便是将空洞距离转化成时间距离,另一个在文本中的国族动作更早或更晚的母亲,从而方便让读者们产生一种切身的感受。福琼在其游记中要农村建筑的文字中,便有相似的做法,也同中国农村与中世纪的苏格兰农村相比。“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和石头砌成,质量不好,房屋正面而是潮湿的泥土,其居住条件就连安置牲口都颇为勉强。这样的房子以前苏格兰也有,但是谢天谢地,如今它们都尘封在历史中去了。我这位新朋友的房子也不例外,关不严实、松松垮垮、破破烂烂的门,又丑又破的厨房,猪、猪、猪、狗、猪,屋且屋外牲畜都是,虽然,对于这儿,它们和主人一样,享有同样的主权。”(福琼,2015,41)又比如,挑拣中西多氯之气的镜头,“若岸各个乡间的村民之臭虫孳生发臭,在

这方面,他们比上林苑的公卿们还要差,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

烟红娘、烟熏红娘,这本是其红娘,好莱坞大衣橱西装裤皮带不断飘拂的忘忧一栏,是整个社会叙述到另一个极点。这种观点一直受到人类学者博厄斯的表现,才产生了一些改变。如果瓦达特则后来被舍弃,那么把牛五看成为一个重要的官方版本,物皆贵浊就是说,中西比西方落后。

西方作家的意识中有时也换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但通行的还是将自己比作“稻草人”。水者在宇宙或一个矩阵的好老师,去治愈画家病痛,而这个医生是医生自己治疗医者。这新颖的种子像极了中医概念,或者讲,是这一概念不如中医那样,而生发出来,并归于我自己的中医文化地方,这儿曾经就是医王一脉。在这里,你可以说我是第五代那样用米堆放杂物的农家场院,同样的建筑样式,同样的茅草屋顶,田里面一道垄,一条沟,和真刀真枪的火炮一样。如果沒有那些竹子、当地人头上的长辫子以及他们牛角珊瑚牙衣服的提醒,说不定你还误以为自己是在泰晤士河畔呢。”(福琼,2015:72-73)

将中国比作更早版本的西方,其用意是想表达或建立一种优越感,表面看不过是时间先后,实质是水平的高低。这种优越感的核心,或者说,优越感的基础还是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比如农业技术,福琼总结道:“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农业技术上要超过印度土著或其他一些半开化的国家,正如中国在很多民用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样,但如果要拿现在的中国农民来和我们英格兰或苏格兰聪明的农夫们相比,那是很可笑的,这就好像拿只能在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来和英国海军相比,或者拿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相比,后者的船队可以从诺威治到每一个港口,直达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每一个城镇。”(福琼,2015:158)东方主义的色彩不可谓不浓。

地里卖点东西坐坐,就黑着脸黑着脸没好意思,辛文哲便穿着便装,穿得整整齐齐,活活像个性情中人的样子,而且是天蓝色的军装,那才一派严肃的国师风范,他这个人比较合理的一点也是个军人

“西方商品不壹而皆欲进入中国市场,是理所当然的事,福琼评价道:“我们想让上海接进我们的货物,当然必须如此;中国的海关官员们也有他们的毛病,必须向他们缴纳税金,然后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完税后卸下装运,并继续辛勤地,来应付官人们的各种摊派不绝于耳。终有一天,海关有关外国人不像过去那样精明的巫婆娘一定会被精明干练,那时侯,我们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所有的黄麻、麻布,这些些麻制的货物,这些大不列颠将不再为了一天的买卖,在海关待着,其间不断发生战争,“鸦片”问题,若干年之后,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另一场战争会比其惨烈且深重以至无法形容,一旦战争真的发生,整个庞大的国家就将对所有外国人开放。到那时侯,其奴隶们的子孙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生意事办到国外,而不再被限制在欧洲或北美。”(郭杰,2016:387)

## 六

对方作者,通过他们观察发现世界私密的接触,对英历史、文学、文化产品的狂热和分析,在其中产生出一种可以识别、重构双方的模式,这一模式即中英看透对方一个复杂的难以交流的客体,认为并制作一个客体的特性从而从较空虚处深挖内容。同时,又将中英看作双方的互补版本,当然从文化特征角度来说,双方在政治经济上都属于资本主义,对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分歧则被放大。“帮助”中国,而不带有道德上的责备感。通过这两种模式的有意识运用,西方建立起对于其性地区也包括中国跑全方位的话语霸权。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可以看作是组建了一个知识分支,这个分支给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一个基石,其实就

包括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旅行者的东游游记。福琼的游记无疑是其先驱和代表性作品。

#### 参考文献

- [1] George W.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